

‘文化问题’。”这就意味着文化讨论的可能性多元走向,由此也可说,当五四新文化运动从初始的文言文与白话文之讨论,尔后竟形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冲击旧礼教,提倡革命性的历史运动,也可以视为历史的必然走向,因为正如徐文所说,“文化讨论在现存社会政治文化秩序中看出‘问题’,这本身就已经显示了对这一秩序的某种批判态度和某种比这一秩序更好、更道德的社会政治文化理想”。理解了这一点,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再去指责它的所谓历史失误呢?至少对于近期以文化批评家或社会学家自居的知识精英们来说,当他们俨然以走向新世纪的学者身份去返身指责历史时,应当以此道理化作一柄利剑,刺戮一下自己不顾当时历史背景而光说现成话的浮泛作风。

想想当代一些知识精英,正在用五四新文化运动赢来的西方科学和理论来对昔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鞭挞,能不让人觉得好笑又心痛吗?读《读书》的文章,得益也就在于此。

走向边缘之前

武汉 魏 新

从季红真《世纪末的回眸》一文中,不难读出一种世纪末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精神疲惫感。对此,时下读书人是不难认同的。因而,走

向十字架,淡泊于“人间情怀”,赚把钱就花,过把瘾就死。总之,“边缘化”,作为主流意识形态消解后读书人多元选择的表现与以前一统的价值观念相比,的确有其值得称道处。但是,如果因此认为知识分子从此可以在边缘角色中找到精神自足甚至自豪的话,那恐怕就大谬不然了。

应该说,知识群体中的边缘意识与其说是知识界自由选择的结果,不如说是八十年代文化反思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主流意识即强烈的人文关怀被人为堵截的结果。加上市场经济的冲击,精神上不知所措的知识分子却发现了治生方面更多的机会。但这并掩盖不了他们精神上的痛苦,近年对“人文精神”的寻呼实际上就是一种痛苦的呻吟。这说明人文精神只是被压抑着,它的历程并没有自然完结。因此,笔者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在心安理得地走向边缘化之前,实际上他们有事要做。

人文精神辩论的“暗礁”

厦门大学 王 诺

南帆在《人文精神:背景和框架》一文(《读书》一九九六年七期)提出,人文精神的辩论遇上了“一个难以绕过的暗礁”、一个“巨大障碍”,即所谓“个体与普遍主义的矛盾”。依我看,问题不在于怎样从理

论上“一举解决”这个“古老的难题”，没有必要再重复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一般与特殊、普遍与个别一类老生常谈。“暗礁”是实在的，具体的，那就是人们对精神、信念、神圣、崇高、意义乃至理性的怀疑和逆反，是长期思想封闭所造成的心理创伤和精神遗患。

对思想专制保持警觉固然是好事，但有人对文化人之间正常健康的思想交锋也感到被压迫恐惧并强烈反弹，却让我想起一种心理疾病：被迫害妄想症。他们似乎不由自主地以过去看“社论”的目光审视今日普通思考者的批评文章，发掘并细细体验那并不存在的专制压迫。没有任何一种主义能不靠权力单凭自身而成为专制思想。关注生存意义和价值的人文知识分子的思想文化批判，与思想路线文化政策制订者的原则主张及其强制推行强迫灌输，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码事，若非心理障碍怎么会分辨不清？

应当以最大的宽容理解“井绳恐惧者”，但这并不意味着放弃与之不同的见解和探索，并不意味着不能与之进行思想交锋和相互批判。没有任何一个思想体系的建立不曾经过对异己思想的“排斥”性批判，也没有任何一位哲人会提出连自己都不相信是正确、普遍有效、趋近真理的思想。人文精神的探讨不是“无关他人的自勉”和“个人实践”，

它不仅是人文知识分子对自身地位和价值的认定，也是——正如南帆所说——他们“改造世界的一种实践”，因此就免不了思想批判和社会批判。你完全可以不信不听或者反驳，但他们却不能不说。多元化是对总体状态的概括，不能成为阻止任何一元批评“他元”的借口和压制言论的理由。没有相互交流促进和批判制约，形不成富于内在张力的多元态势，没有争鸣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齐放”。

也说“文人与乐”

四川重庆 彭小七

《读书》一九九六年七期上，辛先生一篇文章谈到“文人与乐”。我年少时曾学音乐并习作曲，未成，遂于二十岁后“半途出家”，学习语言文学。音乐人未做成，然而对音乐的喜爱和兴趣，从来未曾泯灭。辛先生说中国文学与音乐水乳交融，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文人本来好乐知乐爱乐。此言极是极是。从“诗言志”到“以声拟声”之说，从诗经、乐府到元人散曲、近代诗歌，一部中国文学史，就是一部中国乐文化的脉络史。换言之，同时也就是一部中国文人好乐知乐爱乐的历史。

至于到了中国现当代，音乐与文学的亲 and 现象为何盛极而衰（即文人的“非乐化”），余生也晚，个中缘由，在下不便置喙。而更糟糕的